

深度评论

别拿旧眼光看中外合作办学新常态

■林金辉

近日,有媒体发文“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摆脱规模大质量低”,称一些学校受经济利益驱使,办学热情高涨,但教学质量堪忧。如果10年前如此设问,还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而今,中外合作办学已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和发展新常态,这样的问题显然有些哗众取宠、误导视听。

10年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为1111个。如今,机构、项目总数达到2371个,在校生规模约56万人,毕业生已超过160万人。这个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笔者所在单位完成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发展报告(2014年)》显示,自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在规模有所扩大的同时,优质资源明显增多,监管体系和机制日

益完善,“管办评分离”逐步推行,质量工程有力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逐步提高,社会信誉度和认可度不断上升。

报告还显示,《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在发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工作重点正在实现“三个转变”,即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建设转变,从模仿复制向合作创新转变,从学生流动向能力提升、聚焦优质转变。这是中外合作办学不同于10年前的新常态。

认识和适应新常态要按中外合作办学规律办学。5年前,笔者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二是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认识和适应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认识和适应必须主动把握规律,正确处理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一些媒体或因缺乏常识,或因利益驱动,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不实或虚假报道,影响了其社会认可度。主动认识和适应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常态,需要打好舆论攻坚战。

的基本关系。前些天,笔者在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的理论框架,即适度规模是基础,创新质量是关键,提高效益是目标。合作办学应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新的发展理念统领规模、质量、效益,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协调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

没有一定规模,难有质量。1995年,全国只有71个机构(当时没有项目的类别),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单个机构项目也如此。如果只有几个学

生,安排和组织教学都很困难,质量又从何谈起?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由地方物价部门会同教育、财政部门按成本补偿原则并适当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学生承受能力来确定。如果招生数太少,连成本都保不住,哪来的质量和效益!另外,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应适度超前,确定这个度要顶天立地。一是站位要高,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与对外开放的国家大局相适应。二是根据一个地方、一所学校的实际,“有需要,有条件再办”。当前,政策创新应着眼于拓展新空间,完善规模稳定增长新机制。

没有一定的发展质量,中外合作办学效益难以提高。反过来,效益提高了,有利于促进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目标是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促进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促进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机构项目把中外合作办学当成学校国际化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计经济回报,只谋社会效益。少数办学机构项目片面逐利,由于生源短缺而自动停止招生,或由于评估不合格被“腾笼换鸟”。教育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入口关杜绝了连锁店现象的发生,并强化过程监管,铲除了片面逐利的土壤。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来华合作办学也是由于自身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而非经济利益驱使。例如,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合办昆山杜克大学,就是为了“弥补在美国本土无法打败哈佛的遗憾”。

主动认识和适应新常态需要理论研究和舆论助力。现实中,一些媒体或因缺乏常识,或因利益驱动,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不实或虚假报道,影响了其社会认可度。一些机构项目招生宣传不得要领,有的被“黑中介”牵着鼻子走,误导学生,误导大众。因此,主动认识和适应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常态,更需要打好舆论攻坚战。(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

观点

学校发展 怎能以安全为代价

■陈先哲

据报道,近日广西北海市一所中学因初中部改造项目工程需要,拆除了靠近施工工地的一栋3层男生宿舍楼的一部分,剩余部分仍供100多名学生居住。此事被曝光后,校方表示,目前已经联系好相关部门,近日会对该栋宿舍楼进行质量评估,但学生们仍然不免担惊受怕,“说不定哪天就塌了”。

受到调查后立即表态对宿舍楼进行质量评估,校方看似积极整改,实质上仍是一种无视生命安全、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从联系有关部门进行质量评估到出具评估报告,少则一星期,多则三两个月。在此期间,这栋楼面临着随时可能倒塌的风险,这种押宝式的做法是拿100多个学生的生命安全在赌博。当务之急是将宿舍楼的所有学生安置到其他安全住所,尽管这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然后,再请有关部门进行质量评估,根据结果决定采取何种方案。

“比分数更重要的是健康,比健康更重要的是安全”,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对安全教育三令五申,不少学校也挂满标语,学校领导也把安全挂在嘴边。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学校是这边喊着安全教育,那边却对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不管不顾。前段时间的毒跑道事件余音未了,其他各地仍不断发生此类事件。曾经有人大声疾呼:我们的教育走得太快,请等等落下的灵魂。但似乎没有人听到,当然也许有人听到,但无暇理会。

如今,学校的各种升级改造工程量越来越多,而升级改造的理由似乎也冠冕堂皇,如危楼改造、局部装修、铺设塑胶跑道。应当说,很多升级改造项目的确是改善学校硬件的需要,有些甚至是教育现代化评估明确提出的指标要求:建筑面积要达到多少平方米,塑胶跑道要达到多少米……但是,任何发展都不能作为忽视安全的借口。

另外,涉及孩童生命和健康的校园生产,更加马虎不得,必须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有大量学生同时在进行教学活动的特殊性。学校还应当根据教学周期,尽可能安排在寒暑假施工。施工期间根据学校和学生情况做好充分预案,施工完毕做好相关安全和环保监测,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网言

化解隔代教育焦虑 需扶持幼教

■周龙

心里不放心却又无可奈何,焦虑感自然产生。化解隔代教育的焦虑,目前看来,最便利、最科学的方法不是改变父辈观念,不是提供更多假期,而是提供更多的早教资源。

随着“全面二胎”时代到来,谁来带两个孩子的问题,成为众多年轻父母的焦虑点之一。日前,有媒体问卷调查显示,85.2%的受访者认为身边的隔代教育情况普遍。究其原因,76.7%的受访者表示是年轻父母工作压力大,没有精力和时间照顾孩子。

其实,隔代教育的普遍并不是什么问题。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隔代教育是很平常的事,老人们也都将儿孙满堂视为人生喜事。而隔代教育之所以在今天成为问题,甚至成了焦虑的源头,在笔者看来,首先是因为出现了异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留守儿童问题。

这些年,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学生考学就业,导致传统家庭出现了很大的流动性。年轻一代离开家乡,生了孩子无暇照顾,父母虽然可以协助照顾孩子,但因种种因素不能住在一起,协助因而就变成了全职。

当然,隔代教育成为人们的焦虑点,另外一个原因是“时代差距”。“80后”“90后”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所受教育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养育孩子的观念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年轻父母对于如何养育孩子的认识已经普遍提高,但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支持还停留在“传统”层面。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父辈带孩子的观念和方法又跟不上时代,焦虑和矛盾也就无法避免。

新闻报道中说,有42.5%的受访者提出,希望专门立法为年轻父母提供更多的育儿假期。育儿假期的确能解决一定的时间问题,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笔者认为,育儿假期化解不了养育孩子的焦虑,却有加剧另一个社会问题——就业歧视。我们知道,假期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国家规定,更是雇主与被雇佣者的平衡。假期诉求太多,尽管有法律保护,雇主肯定会变着法子另觅贤才,结果还是个人的损失。

说到底,无论家里有几个孩子,只要父母双方不能抽出一个全职去带,交由别人带着就是唯一的选择。而化解隔代教育的焦虑,目前看来,最便利最科学的方法不是改变父辈观念,不是提供更多假期,而是社会提供更多的早教资源。这种资源必须优质到能满足年轻父母的期待,也需要廉价到让普通父母可以承担。当前公立幼儿园挤破头、私立幼儿园价格涨上天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否则这种焦虑将会长期存在,注定无解。(本文原载12月1日《京华时报》,有删节)



蒲公英评论 网站二维码 中国教育之声 微信公众号

漫画图说

感恩作业不需要包装

近日,据媒体报道,沈阳一所学校给学生布置了一份特殊的感恩节作业:晚上要给父母洗脚。这份看似能让父母享享清福的作业,到头来却让父母忙得手忙脚乱。

原来,要完成这项作业可不是仅仅洗个脚那么简单:洗脚场景要拍照,之后还要打印出来,粘贴在纸上,配上学生和家长的感言。这还不够,因为要进行展览,学校还要求“将页面布置得漂亮一些”。如此烦琐的步骤让不少父母吐槽:这根本就是给家长布置的作业呀!

据学校负责人介绍,“组织学生为家长洗脚,初衷是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让孩子学会感恩、心存他人”。学校的初衷值得点赞,能让孩子在亲身体验中学会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然而,洗脚作业一旦经过拍照、装饰、展览等层层“包装”后,难免多了点儿“秀”的成分,让人觉得感恩的初衷变了味。更何况,感恩教育应该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学校与其在作业的形式上下功夫,不如与家长一起把感恩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这样更能让孩子发自内心的体会到感恩的意义。 焦以璇 文 焦海洋 绘



时评

大学先修课是结盟抢生源?非也!

打破由学校独自开设先修课的模式,设立独立的第三方先修课程平台且所设课程大学都认可,学生可自由选择,这会大大提高先修课程的吸引力,也扩大了学生的选择面。

■熊丙奇

11月28日,由全国40余所高水平大学和重点中学联合发起的中国慕课大学先修课(简称MOOCAP)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理事会也正式成立。有人质疑,自主招生的“北约”“华约”已经解散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高校掐尖的新“某

约”又出现了?(《中国青年报》11月30日)

舆论的质疑可以理解,因为此前我国高校在自主招生中,确实存在过“集团围剿”抢生源、掐尖等行为,但对于高校联合发起中国大学先修课程,扣上“掐尖”的帽子却站不住脚。因为这些先修课程是所有参与大学均认可、学生可自主选择、学生参加某校自主招生而必须选的先修课,而不是大学限定认可的先修课。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角度看,要鼓励这种高校之间的民间合作,共同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选择,而不是结盟搞对抗。

事实上,之前我国高校推出的自主招生联考,本来是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尝试,却演变为高校间

的结盟对抗,把好的改革引入歧途。按照联考的意图,这一联考应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对所有自主招生予以认可,学生自主选择考试。如此,学生可以凭借联考成绩,申请多所大学。大学则根据联考成绩,结合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录取。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联考变为几所高校自己组织,“抱团绑定”与其他学校搞对抗,并规定申请某校自主招生必须参加这一联考,还把联考时间故意安排在同一天,逼迫学生做选择,这就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诟病,直至在舆论的讨伐中叫停。

我国大学的先修课最初也有“抢生源”的迹象,各高校各行其是,搞出一套先修课,将学生选课情况作为

申请大学自主招生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高校通过先修课的选择来圈定生源,因为其他学校不认可先修课成绩。笔者由此呼吁,打破由学校独自开设先修课的模式,设立独立的第三方先修课程平台且所设课程大学都认可,学生可自由选择,这会大大提高先修课程的吸引力,也扩大了学生的选择面。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少数优秀学生的选择?从实际选课结果看,确实是部分优秀学生才选择先修课,但这并非不公平。所有学生都有选择的权利,而选择必须结合自己的兴趣、实力以及未来的升学规划。有的学生连基本的课程要求都难以达到,再去选修大学先修课是极不理性的。

此次全国40多所高校共同发起先

修课,改变了各校各自为政的先修课模式。而把先修课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不论对大学自主招生,还是给高中生提供更多课程资源,都是有好处的。国外大学的先修课程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防止先修课在发展中走样,一方面要避免出现新的先修课联盟。笔者不反对其他专业机构开设先修课,但不能把先修课和学校绑定在一起,而应开放选择、开放认可、开放竞争。另一方面,要增强先修课程平台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目前先修课还是由大学共同牵头,未来应该与大学脱钩,变为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通过较好的课程质量和评价质量,得到更多学校和学生的认可。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入门就想钻空子怎么当老师

不管社会如何变迁,教师的道德修养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一种价值共识。“考试不违规”作为一种社会底线,是全社会成员都需要遵循和敬畏的。

■杨朝清

近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关于2015年11月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违规处理公告》显示,有48名考生被省教育考试院认定有违规行为。该公告一经发布,便在社会上引起热议。不少人有疑问,教师资格考试还违规,如此不讲诚

信,还欲教书育人,如何为人师表?(《工人日报》11月30日)

无论是高考替考,还是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弊,抑或教师资格考试违规,缺乏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人们,总是试图寻找制度设计和监管上的漏洞。考试违规行为让少数人得到便宜,却对他人形成了事实上的机会挤压和权利侵占,造成某种意义上教育不公平。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手段,一旦机会公平得不到保障,就会损伤整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一种失信行为,考试违规不过是当下诚信缺失的一个缩影。与传统的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缺少润滑剂和黏合剂,导致诚信陷入公地悲剧。

社会人员流动加速带来的匿名性和异质性,让人们难以预期彼此行为,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有力的惩戒,自我约束力和外部控制力同时下降时,人们对失信行为变得愈加麻木和放纵。而每一次失信行为,都会损害社会信任。

与其他考试相比,教师资格考试中出现的违规行为更让人震惊和痛心。应该承认,不是所有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考生都会通过这个考试,也不是所有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将来都从事教师职业。然而,教师资格考试出现多起违规事件,至少说明有少数缺乏诚信的人会通过浑水摸鱼的方式进入教师队伍。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反过来,遇到师德缺失的老师则

是人生的不幸。教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职能;教师的角色扮演不仅关乎学生的知识学习,也关乎他们精神世界的发育。一个被功利裹挟、习惯投机取巧的人一旦成为老师,难免误人子弟。而这些精神坐标迷失、价值追求迷失的年轻人,即使能做到学为人师,又如何能做到行为世范?更让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少数人会影射教师队伍。过早地让孩子学会功利和算计,流失赤子之心,必然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长期的负面效应。

在身份社会向专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师作为一种职业的色彩在逐渐淡化,作为一种职业的色彩却在不断加强。可是,不管社会如何变迁,教师的道德修养要高于社会平均水

平,这是一种价值共识。“考试不违规”作为一种道德底线,是全社会成员都需要遵循和敬畏的。如果连这样的底线都不能坚守,又如何去赢得老百姓的尊重、信任和认同?

失信行为最可怕的结果,就是让失信者受益,让守信者受损,从而降低人们对诚信的尊重和认同,让老实人伤心痛心甚至寒心。教师资格考试违规作为一面镜子,既折射出当下社会信任建设需要增强“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也透视出加强师德建设任重道远。让那些精神缺钙者远离教师队伍,既是对教育公平的守卫,也是对孩子们的呵护。说到底,关注师德,就是关注孩子们的现在和未来。(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